第五编

中国共产党诞生

1921 年 7 月，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普通民宅里，在嘉兴南湖一只小小的游船中，一群年轻人将一轮太阳捧出了东方地平线，宣告了一个新世纪的到来。

在当时，也许很少有人会想到，那一排桌子和几把椅子上发生的事情，最终会改变了整个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首创人之忆

几个“毛头小伙”，所做的却是深思熟虑之事，上海夏日七月的风暴在暗中聚集，其时，只有几个明眼人方能听到那无声的惊雷。

埃德加·斯诺

毛泽东回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1919 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看见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接着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一边当教员，一边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那时新民学会的纲领要争取湖南‘独立’,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可以更加迅速地现代化，所以主张同北京分离。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谭延闿被一个叫做赵恒惕的军阀赶出湖南，赵利用‘湖南独立’运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假装拥护这个运动，主张中国联省自治。可是他一旦当权，就大力镇压民主运动了。我们的团体曾经要求实行男女平权和代议制政府，一般地赞成资产阶级民主纲领。我们在自己办的报纸《新湖南》上公开鼓吹进行这些改革。我们领导了一次对省议会的冲击，因为大多

数议员都是军阀指派的地主豪绅。这次斗争的结果，我们把省议会里张挂的胡说八道和歌功颂德的对联匾额都扯了下来。

“冲击省议会这件事被看成湖南的一件大事，吓慌了统治者。但是，赵恒惕篡夺控制权以后，背叛了他支持过的一切主张，特别是他凶暴地压制一切民主要求。因此，我们的学会就把斗争矛头转向他。我记得 1920 年的一个插曲，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个示威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有些示威者要想在会场上升起红旗，警察禁止这样做。示威者指出，依照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警察听不进去。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课，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1920 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 1920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和杨开慧结了婚。”

“1921 年 5 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那年 10 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 [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 [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 [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 [1927 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 [后被害]。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 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 [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 [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 [现为托洛茨基派] 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 [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 [1927 年被害]。王尽美和邓恩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

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瞿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 1922 年 5 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1922 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活动。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1922 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5 月 1 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摘自《斯诺文集》，标题为编者所加

□ 董 必 武*

中共“一大”前后

直到这时，在中国只有很少几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后来，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回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组织党的湖北支部。这是1921年9月才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1年5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我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每个省派出两个代表。从日本回国的学生派一个代表——周佛海。他后来叛变参加了国民党。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大约1935年在红军中工作时与瞿秋白同时被杀）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刘仁静现在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上海派

* 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人，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1920年在武汉组建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后负责湖北省工作。1932年到中央苏区，并随军长征。建国后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75年病逝。

李汉俊和李达。李汉俊 1927 年在汉口被杀。李达现在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成了一个大学教授。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后来叛变成为南京政府的工业部长。包惠僧也成了国民党官僚——内政部长。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后来两个人都被杀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一个来自荷兰——我们称中国名字叫马林。（“马林”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第一个代表）另一个是俄国人，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为会议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所有关于这次会的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我们已经没有一点这第一个党的文件了。我记得辩论的一个观点是党员可以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一些人反对这样做。通过的决议是一个“关门”政策，保持党员的秘密和“纯洁”。我们还决定党员不能参加任何别的政党，像孙中山的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党。我记得会上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包括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汉俊等人。

这几个党的“先辈”除我以外是些老同盟会员，例如陈独秀、戴季陶和沈玄庐。

那时武汉中学是湖北共产党的中心。党支部由我们五个人组成的，不久以后，十个最进步的学生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湖北建立党支部的五个人中的三个人后来离开了党。一个变成了自由主义者，一个现在南京，一个现在汉口当律师。只有陈潭秋和我保持信仰。我不知道陈潭秋怎样了，但是我想他还活着。

武汉不久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共产主义的堡垒。作为一个宣

传中心，那里计划开一个外国语学校，一个俄国共产党员叫马迈耶夫和他的妻子来到武汉任教，但是计划未能实现，所以他们又返回了上海。

在 1921 年夏天，陈独秀亲自到武汉并在一个基督教学校文华大学作了一次讲演。他恰巧遇到一个同大学有联系的工人，这个工人受影响参加了湖北（共产）党，并通过他同棉厂的一些工人联系。这样，党的发展走向工业。

那时武汉有一个激进青年团体，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乌托邦的和半无政府主义的，他们的兴趣在于进行新农村运动。这个中心在中华学院，组织了一个利群书社。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个卓越的青年叫恽代英。他在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是中国的一个最好的青年领袖之一。这个“新农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不久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并有许多人参加了共产党。恽代英后来在四川参加了党，1932年被杀。

—— 摘自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我们湖北第一次代表大会，有三十个代表。我们派学生到农村去建立组织和进行宣传，他们的工作对 1923 年平汉铁路大罢工影响很大。

我的第二个工作是去四川恢复我们的一些老策略，争取军事力量参加革命。那时四川的主要军队有反军阀的倾向，所以我到那里去发展这个运动，我花了一年时间做这个工作，后来党命令我回湖北。也是因为武汉中学急需资金，要我回来募集资金给学校。

我回来以后，我喜欢考虑怎样使党的工作进步，一方面在

学校，一方面在工厂都有进展。那时，共产党工人运动的中心在平汉铁路工人，我们有一个劳动书记部在长辛店。

我父亲在武昌教书，病了。我送他回家，回去不久死了。当我回到武汉时，1923年平汉铁路罢工爆发了。张国焘曾反对罢工。

我所以仍然能够留在武汉，因为我是有名的国民党员，不是共产党员。直到1925～1927年大革命以前，连我家也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

——摘自《一大回忆录》

□ 邓 中 夏 *

回忆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后

……

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无疑的是受了世界革命高潮的影响。我们这里不能不略述当时世界革命高潮的形势。欧洲帝国主义大战以后，接着就发生了一次掀天动地的世界革命高潮，首先就是 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列宁党的领导之下，在最短时间内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与地主的统治，建立光芒万丈的工人国家，这样一个事实，是如何鼓舞全世界劳动群众的兴奋呵！从此就开展一个极其猛烈的革命危机时期，尤其是在欧洲各国。如 1918年 3 月芬兰的工人革命，同年 11 月奥地利和德国的革命，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 1919 年 3

* 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北京大学毕业。曾参与组织“五·四”运动。1920 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2 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参加领导工人罢工。1931 年被王明撤销职务。次年到上海任中国革命互济总会主任。1933年被捕，在南京被害。

月德国巴维里亚苏维埃的建立；1920 年土耳其的民族革命，9 月意大利工人夺取工厂；1921 年 3 月的德国革命。就在远东，1918 年 8 月的日本米荒运动和 1919 年 2 月的高丽暴动。至于当时欧洲各国的罢工运动，更是蓬蓬勃勃，多至不可胜计，例如英国，从 1918 年到 1921 年四年之内，罢工多至四千余次，参加人数达到五六百万人。很明显的，这样一个革命怒潮，以其锐利的形式表现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过程。 1920 和 1921 年世界革命发展到最高度，到 1923 年年底才受挫折而低落，因为 1923 年的秋天，保加利亚的暴动和德国无产阶级革命，都遭到了极大的失败。

中国职工运动就是在这个世界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因为革命怒潮导源于俄国，泛滥于欧洲，很快的也就浩浩荡荡的冲到远东，中国的万里长城堵不住了，中国的工人群众被这种潮流惊醒了。

世界革命潮流的消息当时在中国报纸上真是“日不绝书”的，中国工人的文化程度虽然落后，虽然百分之九十是不识字不能直接看报，然而街谈巷议，工人们是听着的。中国工人经济生活那样极人世间少有的痛苦，迎受世界革命潮流，不用说是很自然的；特别是俄国十月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更使得中国工人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励。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职工运动开始它的黎明期了。

……

1920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然不是偶然的，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产儿。它产生的时期，在国际上，有资本制度崩溃过程中的世界革命；在国

内，有资本主义工业相当发展中的原始自发的罢工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确已开始趋向于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个阶级的基础上生长起来。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便能表现它在工人运动中伟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从此有了他们自己的政治领袖，开始引导他们走向革命斗争的大道。

……

中国“现代式的”职工运动，无疑的是从中国共产党手里开始。有了共产党，然后才有“现代式的”工会，从此中国的工会才渐次的相当具有组织性、阶级性以至于国际性。我们这里来叙述中国共产党做职工运动的起点。

1920年夏，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即开始出版工人小报，上海出版的叫《劳动者》，北京出版的叫《劳动音》（后改名《仁声》），广州出版的叫《劳动声》都是周刊。上海还另外有一个专门对店员宣传的小刊物叫《伙友》，这几个刊物大都只出了几个月便停版了。

组织工人工作是从1921年开始。

1921年1月1日，北京党部开始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长辛店是京汉路北段的一个总站，距北京四十里，这里有一大工厂，工人三千余人。张特立（即叛徒张国焘）和邓中夏同志在上年底到此地与工人接头，筹划此地开办学校，那时还是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与几个觉悟工人几经磋商，经过相当的筹备，遂决定这年元旦开学。这里要指明的，当时发起学校之中，还拉拢了几个有力工头，因为开始必须得到他们的赞助才行。学校经费是由募捐得来。教员都是用北大学生会名

义派去的，先只常驻教员一人，即吴雨铭（叛变）。后来教务发达，增加教员数名，也任用非同志。这个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是工人子弟，夜班是工人，但多青年工人，老一点工人不愿读书。

这个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果然不到半年，5月1日劳动节，长辛店公然发生了一个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

参加游行的竟有一千余人，并且在群众大会上通过成立工会。但工会通过成立，实际上并未切实组织，不用说是我们当时经验欠缺所致。的确工人的觉悟从此日益发达了，首先表现工人与工头的斗争。上面说过发起学校时还包含工头，但是工人觉悟日益发达，于是工人内部便发生分化，工头表现反动，而工人便和他斗争。这种斗争是不断的发生，而且愈斗争愈激烈，有几个工头竟被工人强迫工厂开除，驱逐出境。这样一来，工人更感觉得组织团体的重要了。开始组织工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实际上是工会之变名。为什么不叫工会而叫俱乐部呢？工人们说：“工会是工头共同发起的，现在我们独立组织了，不要那个名称，要由另外一个来分别。”这种话从现在看来是可笑的，但即此可见当时群众的情绪。真的，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工人俱乐部”这一名称，相习成风，成为当时全国各地（广州除外）工会通用的名称。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加入者日益加多，取得群众很大的信仰。工人有了团体觉得自己的力量了。譬如以前乘火车自长辛店至北京，照例如常人一样须买车票，此时都不买票

了。调查员询问时，工人瞪着眼说：“票吗？我是俱乐部的会员，有徽章在此。”查票员只得一声不响过去了。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影响所及，自北而南，蔓延到各站，有好几处也成立了工人俱乐部，特别是南段总站江岸的工人俱乐部组织最强。

此时，共产党北京党部出了一个《工人周刊》，主编者为罗章龙。介绍国内外劳动消息，并极为鼓吹组织工会。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一切活动，当然在此刊物上尽量宣布，这样一来，使得北方各铁路工人知道长辛店俱乐部，大家不觉油然而生羡慕之心；在当时工人们仿佛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天国”，于是各处纷纷派代表前来长辛店参观。这当然不用说给了我们更好的机会，乘时宣传，各地代表归去后也模仿长辛店组织起俱乐部了。因此，北方各铁路开始都有了工会组织的萌芽。

共产党上海党部在 1921 年亦开始做组织工作，首先在沪西小沙渡。此地是上海纱厂集中区域之一。着手也是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主持者为李启汉同志（牺牲），其影响当然不及长辛店，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仍有它的意义。

长辛店和小沙渡两地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此外共产党的武汉党部、湖南党部、济南党部、广东党部也开始了职工运动的工作。

……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上海，开始成立中央委员会。大会以后，成立一公开的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定名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是张特立，干事为李启汉，李振瀛（脱党）等。发行《劳动周刊》。劳动组合书记部

成立之后，对于上海，确有相当影响，因为上海工人经过这个机关，也逐渐有了组织了，并且还领导了不少的工人斗争。

……

在此时期中，全国自发的罢工斗争仍不断发生，间亦有为共产党所领导的，总计大小罢工不下九十余次。这里只略述几个大的罢工。

一、香港机器工人的大罢工。1920 年 4 月，香港机器工人，因米价太贵，生活困难，又因外国资本家常借口营业衰减，辞退工人，遂宣布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参加罢工的五千余人。结果，由劳资双方代表谈判。计罢工二十五曰。这里须指出，香港机器工人给予香港海员不小的刺激，因而有 1922 年赫赫有名的大罢工。

二、上海杨树浦日商纱厂大罢工。先是 1919 年长江下游一带米粮歉收，但奸商却运输出口前往日本，因此，上海米价飞涨。日本资本家在杨树浦所办的第一、第二、第三纱厂工人，因米价高涨，难以度曰，要求每月每人加工资一元，厂方不允，遂于 1920 年 6 月 26 日宣布罢工。结果，由厂方允许每月售与每人最上秈米三斗，不论市价如何，每斗取价八角，至米价平定为止。计罢工十三曰。

三、广州机匠大罢工。1921 年 6 月 14 日，广州机匠万余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罢工时与粤汉、广九、广三三条铁路上之机匠一致行动，经当地政府调停，结果，加工资百分之二十至五十。计罢工三曰。

四、上海英美烟厂新旧厂大罢工。1921 年 10 月 24 日，因新厂机车间与监工冲突，发生罢工。参加者万余人，结果，双

方会议，和平解决。计罢工三日。

五、粤汉铁路武长段大罢工。1921 年 10月 13 日，发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由北京政府交通部调查，结果，工人胜利。计罢工五曰。

六、陇海路铁路机工大罢工。1921 年 11 月 17 日，发生罢工，全路停车。要求撤换洋总管若里，并要求恢复原薪及原发材料。结果胜利。计罢工十日。

七、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大罢工。1921 年 3月 1 日，发生罢工。反对车行增加车租。哄动了租界内五国领事，商量对付之策。此次罢工甚为壮烈，车夫被捕，乃举行了大示威游行，与租界巡捕冲突，以至流血。后经各国领事、商会、基督教青年会、洋车行经理、夏口县知事、洋务所长等会议：决定两星期不加车租，再由青年会研究善后办法，被捕车夫释放，计罢工七日。

以上七大罢工，上海英美烟厂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参加去领导的；汉口人力车夫和粤汉罢工完全为共产党武汉党部所领导的，陇海铁路罢工，共产党北京党部闻讯派人驰往参加则已解决。由此可见共产党在 1921年下半年的确渐能领导罢工了。特别是武汉因铁路工人与人力车夫两大罢工，开了当地一个新纪元，职工运动从此有一个顺利的进展。主持者为林育南（牺牲）和施洋同志。

……

我们这里首先略述当时中国知识阶级的思想斗争的概况：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阶级思想为之崭然一新，相率竟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尚为德莫克拉西的宣传，继